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        |                      |          |
|--------|----------------------|----------|
| 【亡灵祭坛】 | 无辜冤魂的祭念——湘南大屠杀50周年祭  | 陈秉安      |
| 【各抒己见】 | 赤子同心，与子同行            | 韩爱晶      |
| 【劫后反思】 | 忏悔的沉重——武汉二十中早期红卫兵的坦白 | 佚名       |
| 【书刊介绍】 | 《云南文革史稿》导言           | 周孜仁      |
| 【春秋史笔】 |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 张戎、乔·哈利戴 |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亡灵祭坛】

无辜冤魂的祭念——湘南大屠杀50周年祭

• 陈秉安 •

今天（2017年7月23日），是湘南大屠杀发生50周年的日子。

50年前，由于奉行阶级斗争的政治策略：将中国人分成地主和贫下中农等不同的阶级等级，宣扬和煽动相互的仇视和对抗，以便统治。终于导致了愚昧的中国农民起来对地主的大屠杀。

1967年7月23日，在湘南永州市零陵县的双江桥，贫下中农自发起来将地主蒋兴及其两个儿子，杀于双江桥下，从此揭开了湘南大屠杀的帷幕。其后，此风从永州市蔓延到相邻的邵阳、郴州、衡阳4市14个县。

在“杀光阶级敌人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下。贫下中农纷纷起来“杀地主”。从80多岁的老人到几个月的婴儿共计一万多人无端被杀，尸陈旷野，江水飘红，数日不褪。最为疯狂的道县，一县之中被杀者达4559人（官方统计数字）。

血迹虽干，人、物证俱在，值此50周年的祭日，撰文留照以祭。

本文仅取湘南大屠杀调查的其中一例：道县李念德一家13口被杀事件，由李念德兄妹口述其事件原委。

（一）我怎样在杀人前逃脱——李念德（口述）：

我叫李念德，1946年生，湖南省道县金狮庵村人。现住道县县城，从业律师。

我的祖父叫李文梁，原本是个无田无土，靠做长工度日的穷人，后来学了点医道，在当地行医，到接近解放的时候，凭着勤吃苦做置了62亩田，因此，土改时被划为地主。加上我的三叔李光佐加入过国民党部队，抗日时候任团长，所以又被当为“反革命家属”看待。

1967年的8月，道县有人制造谣言，说台湾的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地富反坏”已经占据了都庞岭，要在阴历的八月十五举行全县大暴动。一下子人心惶惶，贫下中农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先下手为强，任意批捕、屠杀“地富反坏”分子。首先从道县的寿雁公社开始，接着是杨家山公社、清塘公社……全县各区各公社几乎全部举起了杀阶级敌人的屠刀。说杀干净阶级敌人，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在这股风之下，我们金狮庵村贫下中农协会，也在暗暗密谋着杀人，我们一家当然更是他们屠杀的重要对象。

当时，村里一个姓陈的妇女主任，是个党员，冒着生命危险来提醒我们家的人。但这号事，谁能相信呢？都是乡里乡亲的，又从来没有仇恨，就是杀只鸡都不轻易，何况是杀人啊？都不敢相信真会动手，尤其我的父亲，总是相信“党的政策是好的”，不会杀人。我的伯母则是抱着“听命”的想法，说我们这些头上戴着“地富反坏”帽子的人，就是笼子里的鸡一样，他们要杀，还不是给他们杀。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的母亲抱着一线希望，让我上城里打听，以便下一步的办法。

我一到城里，就在城墙边碰上了初中时的一个同学。他正好是从寿雁公社来的，一见我就说：“哎呀，念德呀，我们那边都杀起来了，你家不是地主吗？你快点逃啊，越远越好！”

听他一说，我紧张了，菜都没敢卖，赶忙挑了箩回去，找我母亲商量。我母亲是个很有智慧的人，她说，你年轻力壮，又有些文化，早已成为某些人的眼中钉了，你危险最大，你要赶紧跑，跑远点。

父亲看我这么晚才进屋，怕我辛苦，还说：“冒那样快吧，你睡一晚再走。”母亲似乎天然更敏锐：“不行啊，一刻都莫停，赶快走。”

后来证明，就是母亲这句话，救下我一条命。我们说话时，那晚贫协正在大屋里开会研究，全村第一批要杀9个人，中间就有我，说我最不老实，又高大，要先搞掉才放心。

我揣着母给我的10块钱，逃到了与江永县接壤的祥霖铺。离开了屠场，我的命保下来了，但我的父母，还有叔叔伯伯兄弟，一共十三口，我却永远也见不到他们了！

到了祥霖铺，我一想，这里恐怕也不安全，隔金狮庵才几十里，我还得逃远点。

但是，逃跑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虽说是逃出生天，世界这么大，我逃到哪里去呢？人到急时，慌不择路，到哪里都可以，我顺便攀上了一辆祥霖铺去江永县桃川镇的汽车，茫无目的地就到了桃川镇。谁知道正好桃川那里在砌屋，需要人“烧砖”，把我留下了。我就躲到深山里，搭棚打砖度日子。为了安全，不敢下山，晚上就睡在窝棚里。

那些天，好难过啊，我人在打砖，心中却在念着村里的父母亲人。我跑了，那些人肯定不会被轻易放过他们的，不知道是死是活。

（二）我一家13口人是怎样被杀的？——李新玉（口述）：

我叫李新玉，1950年生，是李念德的妹妹。现住道县城里。

哥哥走了，我还留在家里，所以知道后来杀我父母的事。

过去快50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67年的8月22日，农历的7月17日。

本来，我哥哥跑了，走脱了一个，我们一家人心里安然了一些，但是以后会怎么样？他们会不会来抓我们？谁也不知道。正是“双抢”大忙的时候，只能是低着头，装着冒事一样，照样插田割禾。

那天，我们一家从田里收工回家，已经快到晚上8点了。突然，村头大树上的喇叭响了，说是全体村民到李家大屋门前开会，还特别说：“地富都要参加。”

因为平时开社员大会，地富是没资格参加的，这次全都要去，我们心里好怕啊。一家人吓得饭都不敢吃，赶紧踩熄了柴星火，赶去开会。

到会场一看气氛就不对，大屋的坪里民兵围出了一个圆圈，开会的人都到圈子里去坐着。四周的路口，都由带枪拿刀的民兵站了岗。等村里人到得差不多了，那个贫协主席刘代修就在台上宣布：“我们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今天要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地富反坏，现在宣布名单！”

接着就点名了，点一个名民兵就在人群中捆一个上去，一共捆了7个人。我们屋（家）里一共捆起4个人：我父亲李光伟、四伯李光佑、五伯李光修、堂兄李美德、另外3个是同村的艾学书、艾三古、艾四古。

本来还要捆我哥哥和一个叫郑会伦的，因为妇女主任陈小六通了消息，郑会伦中午就躲起了，藏在楼顶的夹板里，两个都冒杀到。

他们叫7个被捆的人上台后，都朝毛主席像跪下，低头认罪。然后，贫协主席刘代修就宣布说“现在，贫下中农最高法院判处你们死刑，立即执行！”说完，那些民兵把人架起就走。

可怜我爸爸，刚刚收工回来，还是赤脚、汗衫，连饭都冒吃，死也不肯走，不舍得去死呀，他们就用绳索在地上拖着他走，硬是拖到后岭山上去的……

他们7个人就这样给他们拖起去杀了。有的是用枪打的，有的用锄头敲脑壳的。杀的那地方叫“龙泉古”山，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坑，叫“妈妈坑”，他们早研究好了的，7个人杀了，就丢到“妈妈坑”底下去，埋都不用埋。

我和母亲，还有妹妹李紫玉，只有眼睁睁的看着父亲拖起去杀，连声都不敢出，要出一句声，连我们都会拖去杀了。

父亲就这样给杀掉了，回到家里，一家人躲在被窝里哭，还只敢小声地哭，生怕外面听见，又来抓我们。

但是，怕也怕不脱，杀了我父亲后才几天，他们又要来杀我母亲了。

金狮庵杀第二批人是在 1967 年的 8 月 28 日，农历的 7 月 23。这两个日子，我都记得的。

那天黄昏收工回来，就有民兵来通知我们，说晚上到大屋里去。我的母亲王满珍一听，就知道事情不妙了，她很冷静，也不说什么，就是把家里的两只鸡杀了，反正也吃不到了，让一家人吃最后一餐饭。但是哪个吃得下啊？鸡肉夹在筷子上，娘望着女，女望着娘，眼泪就往下滴……（哭泣）

奇怪的是，那夜民兵叫走了我母亲，我走到门口了，以为也要跟着走，他们却摆摆手，把我和紫玉两姐妹留了下来。为什么没杀我们，等下我再讲。

当夜，他们把准备要杀的人在仓屋里关了一晚，第二天上午用绳索捆起，押到村边一个叫“黄旗子”的地方去杀。

第二批要杀的人一共是 9 个，都是我们李家的，他们是：我的母亲王满珍、伯母罗云珍、三叔李光仁、堂兄李道德、堂弟李怀德、李胜德、李明德、李承德（残疾人，哑巴）、李满德（14 岁）。

刚刚捆起走，乡里就打电话来了，说不准杀人了，电话是小学校的民办教师魏永跃接的，魏老师就火急跑跑去叫组织杀人的贫协主席刘代修，叫他不要杀了，说来通知了，赶快放。但是，那个刘代修却说：“人都捆起了，杀了就杀了，千斤担子我来担！”

他们把我们家 9 口人，就这样，硬是押到了“黄旗子”。

怎么杀的呢？真是下得了手啊！3 个是用刀砍的，4 个是用枪打死的，两个女的我母亲和我四伯母是用绳索勒死的：拿绳子将两个老人缠住脖子，两个民兵一头一个，硬是活活地扯死。你晓得，一条命啊，扯死也是不轻易的，我母亲痛起在沙滩上滚，在场的人后来告诉我说，十个手指头在沙上抓的印子一条一条的……

你说怪不怪啊，刚刚杀完了 9 个人，突然天空就阴云滚滚，沙滩上沙子到处飞。那些杀人的好怕，说是老天爷来报应了！那个刘代修还对着天大笑说：“老天爷下大点！冲到河里去，省了埋人的工分！”

因为前一晚支部会研究决定：埋一具尸体，给 10 分工分！

杀了人以后，8 月 28 号那晚上，真的铺天盖地地下了一场大雨，真的是老天爷都在哭啊！

（三）杀人凶手怎样追杀我——李念德（口述）：

金狮庵在杀人，我在山上一无所知，只是心里忐忑不安，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谁想到，刘代修杀了我全家13口人后，又得知了我躲在桃川的消息，他们要斩草除根，又要来桃川杀我了。

在此之前，我也早作好了同他们“拼”的准备，反正就是命一条！

我把逃跑的路径都看过、想明白了，又把睡的窝棚换到更深的山窝子里去，上策还是避开他们。还特意选了一把砍柴刀，磨得雪白锋利，再插上一根三尺来长的杂木把，时刻带在身边。所谓长兵器不怕短兵器嘛，他们真要来抓我，就同他们血斗一场。

那天是中午饭时分，我刚要下窑，猛地就看到山下面树叶子晃动，再一看，是刘代修带着五、六个人摸上来了！那时我年轻，来五、六个人根本不害怕，一跳就上了窑顶，把大刀举起，大喊：“我们都是乡里乡亲，不要逼人太甚，要是真伤了亲戚，不要怪我！”

来的那帮人同我都是自小认识的，家里也都有老有小，谁愿意为了几个工分拼命？刘代修身小力弱，他一个人不敢冲，我乘机挥刀杀出重围，一口气跑上了后面的都庞岭。

上了岭，我气喘吁吁，回头看看，发现他们胆小，并没追来。

因为事前有准备，所以仓促之间我也不惊慌。还在岭头的一块大石头上抽了一支烟。

我想，在道县我是无法安身了，只有远走高飞逃命。但是逃往哪里？靠什么维生？心里空落落的。

我按照原来看好的地形、方向，翻越都庞岭的龙虎关，过到广西境内，然后从那里坐班车到了广西恭城。

到了恭城了，因为是邻省了，我感到就有几份安全了。

坐在一家小店里，要了一碗面，我才开始想下一步怎么走。

人平安了，才思痛，当时已有桃川人告诉我家里的情状，想起一家父母、叔伯、兄弟，13口人活生生被他们杀得干干净净，好惨啊！我一个人高马大的男子汉，坐在店子里捂面大哭一场，引得店里的人个个来问为什么。我只好说是母亲病故了。

那时出门在外，是要有大队证明的，我什么都没有，就是逃到天边，也会让他们抓起来的。再说，没户口，没粮本，我吃什么？黑人黑户就是“坏人”，这个管人的办法，管得好死啊！

想起这世道太不公平了，我家就是因为出身地主，就应该被他们斩尽杀绝？我祖父有62亩田，就犯了这么大的罪？我心有不甘。我要到中央去告刘代修他们，为我家的13口人报仇！就是死了，我也要死在告状的路上！

主意已定，我就混上了从恭城到桂林的班车，又买了火车票，从桂林坐上了火车，一直到了北京告状……

（四）父母被杀后我和妹妹的遭遇——李新玉（口述）

哥哥一去没有音讯，家里人都被杀光了，就剩了我和妹妹紫玉。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杀了我一家13口，却不杀我和紫玉的原因。

那时我已经17岁了，妹妹紫玉也12岁了。那帮天杀的，他们留下我们两姐妹，是准备要“奖赏”给贫下中农中那些讨不上老婆的光棍，或是在杀人中表现积极的人。

我们真是走投无路啊，望着空荡荡的屋，想起那些坏心肠的人还会来找我们，好害怕啊。晚上关起门来，还要加撑一根棒棒，躲在被窝里，两姐妹抱着哭啊，哭啊，眼泪都哭干了。

可恨刘代修那一班人，杀了我家的人不打紧，还要分我们家的“浮财”。由大队会计何秀文牵头成立了“分浮财小组”，跑到我家来，见什么拿什么，就象电影中的日本鬼子一样。家里的鸡啊、猪啊、好点的桌凳啊……拿起就走。

抢了我家的鸡、猪，这班杀人的凶手们，还在村中的大屋里摆了几张大桌，杀猪、宰鸡，喝酒吃肉，庆祝胜利。

后来听人说，吃饭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要把我赏给光棍XXX的，但是，党支部书记胡成位打了个坏主意，他想到自己的一个亲戚还是光棍，便说“这个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反正女仔早晚是要归贫下中农的。”

这样，我才侥幸躲过一劫。

但是，这一来我也明白了，金狮庵是住不下去了，我早晚会要落于他们的魔掌，我只有走。这时，有好心人来给我做介绍，说在道县林场为我物色了一个人家，男家成分好，嫁过去就成了贫农，就放得心了。人家也不嫌弃我家成分高，家中刚出过事，并且同意按年接济小妹紫玉的钱、米，我就答应了。

但是，把12岁的紫玉一个人放在金狮庵，我心里哪里安啊？临走的时刻，我们两姐妹哭成一团。我说妹妹啊，姐姐也是没办法啊，我去之后，早晚会来把你也接出去的，你等着我啊！紫玉却安慰我说，姐姐你走吧，走脱一个是一个。

她后来是过的怎样的日子？我想都想得到啊。孤苦零仃一个人，家里什么都没了，穿的是破衣烂衫，吃的是清水煮红薯。评工分的时候，她得到的要比贫下中农的子女少一半。后来她养了两只鸡，队里都不准她养，刘代修凶着她说：“地主子女还想养鸡，你们的父母吃多了，把你们的都吃过了！”这个狠心的，硬是拿棍子把鸡打死了！

那个时候的日子，真是生不如死啊！

我不能每天同紫玉在一起，一月两月才能回来看她一次，每次我都是说，妹妹，你要顶住啊，哥哥很快就会回来的，那些黑良心的人，终归会偿命的。老天是公平的，决不会放过他们。我们要熬着啊！

但是，几经波折之后，紫玉终于没有了活下去的勇气，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上吊死了！

（五）专制虽然强大，但它斗不过时间——李念德（口述）：

80年代，我从北京告状回来，听说紫玉死了，我悲恨交加，曾想到过去找仇人刘代修拼命，但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为了报仇去付出一条性命不值得。

在外跑了一趟，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还有更多的事要做。

从此，我不再纠缠在个人的恩怨上。我明白了这世界上不止是一个刘代修！

1990年，我就报名参加了正规的律师训练班学习，我成为了一名律师，我要替成千上万的被杀了父母、兄弟、妻儿女的受难者家属，和天下遭受不平的人们申诉不平！

从此，我被称为道县的“告状专业户”，和一批受难者的家属，以法律为武器，走上了漫长的向县、市、省，乃至北京中共中央告状的道路……

我问道县告状的领头人之一的李念德：“你们以法律为武器，一直在告状，要讨个公道，但是，快五十年了，你们也没把他们告倒，而你们这一批人在老去、死去。往后你们打算怎么办？”李念德面有戚色：“说老实话，不知道。不明白，不甘心，但又不知道怎么办……”

◇ 旁叙：

1992年的2月15日。对于李念德说，这是他人生中又一个激动万分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他的妻子熊矿莲就要生产了。

对于李念德说，这是他人生中又一个激动万分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他的妻子熊矿莲就要生产了。

一生为了告状，无数次的跑北京，跑长沙……。前前后后25年，李念德满头的青丝都告成了白发。终于在亲友们的撮合下，在44岁那年，才成了一个家。

一年后，熊矿莲怀孕了。

李家一家，所有的男人都杀光了，李念德怎不希望有个男丁来继承李家的烟火？

医院壁上的时钟“的哒、的哒”……，李念德紧张地守在产房门边。

难道是这婴儿命大？难道是祖上念这冤情未结？你看奇怪不，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就在这一天的正午12点的时候，熊矿莲产下一个男孩！

李念德给孩子取乳名为：“正午”，取书名为：继祖。

继承祖先，继承你的父亲，那是希望的名字啊！

李念德说：专制虽然强大，但它斗不过时间！

附记：2017年1月，李念德因心脏病在道县家中去世

~~~~~  
【各抒己见】

赤子同心，与子同行

• 韩爱晶 •

〔本文系韩爱晶为原文革时期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岑颖义等人编著的《赤子——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文革回忆》所作的序言，该书已由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于2016年5月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之际在香港出版。——编者注〕

武汉革命造反派是我们北航红旗的战友，岑颖义是我的朋友。当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紧跟毛泽东主席，以大无畏的精神，投身文化大革命。《赤子》一书记录的是我们患难与共的战斗历程。我祝贺《赤子》出版发行。

早在1966年底，北航红旗总勤务站的屠海鹰大串连经过武汉，说服父母亲拥护文化大革命，影响妹妹在《长江日报》社造反。在关键时刻，北航红旗的姜允珍、王守信、方正、徐鹏飞、田永丰等同学先后和武汉的战友们并肩战斗。

1967年6月，北航红旗战士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跟随谢富治，王力率领的中央代表团去云南、四川解决问题后赶到武汉，并于7月19日凌晨随谢富治、王力来到红水院表示支持。

7月20日，百万雄师和8201部队的人冲进东湖宾馆，抓走王力，在军区大院批斗。当天上午10时，尹聚平途中逃脱后，到红水院总部给我打电话，讲述了武汉发生的情况，我赶紧向中央报告。7月21日上午，胡慧娟也来到红水院，是红水院总部派人护送尹聚平与胡慧娟去东湖宾馆，回到周总理身边。

7月22日，我赶到北京南苑机场，跟中央领导一起，先迎接周恩来总理的飞机降落，随后又在周总理带领下迎接谢富治、王力等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吴介之、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等也随同回京。

7月25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会前，我和尹聚平、胡慧娟等在天安门城楼大厅，听王力谈“七二〇事件”。当我看到林彪从外面走进大厅时，我立即迎上前去，把林彪接到王力旁边沙发上坐下，听林彪谈对“七二〇事件”的看法。

“七二〇事件”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让我们把张体学抓到北航问他与“七二〇事件”的关系，我听他说与此事无关，就劝他给毛主席写检查，争取出来工作，我帮他转呈上去。竟因此与张体学结下友情。

8月5日，天安门广场又召开百万人大会，纪念毛泽东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一周年。我在城楼大厅向周恩来总理请教，能不能说共产党里有阶级，周总理指出不能说共产党里有阶级。我提出武装北航红旗，保卫首都，保卫毛主席。周总理当即同意，并于8月16日向北航发放枪枝。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过程，如黄河东去，九曲十八弯，武汉“七二〇事件”成为文革重要转折点之一。1967年8月底，王力、关锋垮台，形势变化，深不可测。怎样评价文化大革命，人们见解各异。我主张首先还原真相。《赤子》一书即水院文革纪实，书中的史实和见解对我们研究文革很有帮助。

文革之后，我多次向杨道远、徐海亮和岑颖义等发问：文革前，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好的，为什么要在全国开展夺权斗争呢？比如说，在湖北省委里谁是走资派呢？造反派凭什么夺权掌权？

岑颖义在书中引用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检讨：“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促生产，借口李迎希（原编注：李迎希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参谋长，开国少将，因坚持毛主席继续革命路线，支持造反派群众，受到陈再道等人的打击排挤）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

岑颖义在书中重述周恩来总理1966年12月6日在中央常委会议讲话：“我们的所有制虽然变了，是公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特殊阶层就会把它变成私的，就会变颜色。”

中国的现实验证了周恩来的预言，官僚权贵们几乎是采用公开的手段把人民的财富占为己有，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披露，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我们赞成改革开放，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党政领导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状况，学习欧美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我们反对利用改革开放搞官僚资本主义，我们反对两极分化，反对毒品、娼妓和艾滋病泛滥，反对买官卖官、金钱至上、无计划生产、破坏资源环境……

文革留下宝贵经验，也留下严重教训。当时受冲击的干部以及不理解文革甚至反对文革的人，大多数是拥护毛泽东主席、拥护社会主义道路的。那么，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为什么能欺骗广大党员干部，在中国一步一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呢？原因很多，首先是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资产阶级力量总体强过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同时，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文革的方法也有问题。当然，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我们的人民都创造了辉煌业绩。

文革中，出现了严重的阴暗面，有的问题与拥护文革的人有关。比如我，当年主观上是努力紧跟毛主席的，大多数言行与毛主席的要求是一致的，但革命理论掌握得不好，缺乏政治经验，也没有与工农兵结合，我的问题主要怪我自己。但必须指出，文革中有的严重阴暗面是反对文革的人蓄意制造的。

对于文革阴暗面，应该还原历史真相，在人民制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当年十八岁以上公民都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包括我在内。

岑颖义在书中写到，全国抓了五百多万“五一六”分子，整了一千多万人，其中有一些与“五一六”问题毫不沾边的群众和干部，被整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被关押、隔离，投入五不准学习班，被定点连续批斗，选点远距离巡回游斗，被迫悬梁、服毒、跳楼自尽者数以千计，被枪杀、判刑、双开、劳教、罢免、降级者比比皆是。许多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许多人株连亲朋、殃及子孙，许多人几十年生活无着、投诉无门，还加上无限期监控。

抓“五一六”的时候，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有共产党坚强领导，有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文革纲领性文献，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解放军就是抓“五一六”的重要力量，比如曾思玉将军。这就说明，当时我们的制度有严重的漏洞，至少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法制极不健全，人民民主得不到保障。

1970年开展的一打三反，各地杀人，也出现很多冤假错案，后来停止，是因为年迈的毛主席知道后批评说，我们不靠杀人统治。

1980年以后，在平反冤假错案时，中央一位高级领导人说，四人帮没怎么插手抓“五一六”，因此不必要复查纠正。（原编注：由此可见，全国范围内大抓“五一六”是走资派所主导。）

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历史教训必须正视，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担任过党和国家领导的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也应该人人平等的，对建国以来的错误应该承担自己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以什么名义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党和政府应该对建国以来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公民及其亲属做出赔偿。

毛主席逝世后，有些中央领导人对青年学生的问题采用双重标准，他们一边反对搞运动，一边又用运动的方法搞“揭批查”；他们一边平反冤假错案，一边又制造大量新的冤假错案。他们打击报复，镇压民众，剥夺了人民的监督权，为贪污腐败、化公为私创造了条件，为资本主义复辟打通了道路。现实教育了人民。

岑颖义在书中写道：2007年7月，以产业工人和造反派红卫兵为主体的三钢三新的主要头头，与同样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百万雄师的主要头头相聚，百万雄师原联络部长章迪杰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你看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当中好多同志都下岗了，弄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生活十分困难。”长办革委会原副主任顾建棠说：“搞改革开放并没有错，毛主席就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现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方向和落脚点不对头，改了社会主义制度，革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敞开国门引狼入室，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统统放出来了，就是打着共产党招牌搞资本主义。”百万雄师原作战部行动组副组长刘天喜说：“再来文化大革命，我和你们一起造反。”

现在的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同利益群体尖锐对立，现代传媒比大字报快万倍，社会矛盾引发的派性比文革时期还严重，如果不是国家机器的控制和调节，当今中国真会出现全面内战。我和左中右人士都有接触，虽然他们观点水火不容，但绝大多数人希望中华民族文明进步，希望社会公平正义，希望人民生活幸福。他们关心天下大事，归根结底，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应该怎么办？

我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我热爱和平。我希望用对话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希望尽量避免暴力对抗，实在无法避免，也希望社会付出的代价尽量少。即便暴力对抗也还要进行和谈的，一方取胜，最后也要允许战败方生存并构建和平。实际上，人民大众的基本利益是一致的，我说的人民大众，主要是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及市民等，还有那些合法致富的人们以及不搞严重贪污腐败的党员干部。

像令计划、徐才厚那样的一小撮严重的腐败分子是人民大众敌人。有人说，1985年以来，大富豪邵逸夫先生向内地捐赠47亿多港币，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教学楼、医院等设施遍布中国、为什么身为“共产党员”的中国高官却连公布私人财产都不敢？！

有些人，主张照搬欧美的社会制度，把美国当作榜样，我看他们还不如美国人自己清醒。2016年2月9日，在新罕布什尔州大选获胜的博尼·桑德斯说：美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已经超过地球上所有主要国家，占总人数1%的顶层人群，他们掌握的财富相当于占总人数90%的底层人群的总财富——这不公平！20名富豪的财富，超过了全国一半人口的总财富，这也不是公平。

我主张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借鉴学习别国的经验，包括欧美的经验。必须指出，欧美的一些成功经验是人民大众长期斗争的成果。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在人民监督下为人民服务，在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民营经济为辅的前提下，学习欧美的宪政民主、三权分立，逐步从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社会过渡到人民立宪的社会，对官员和司法实行严格的民众监督，建设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社会。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五周年，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前头英勇牺牲，不是为了把中国变成新的官僚权贵们的盛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王岐山顺应民意，打击贪官。习近平、王岐山是历史造就的大英雄。当然，没有圣人，也没有绝对正确的领导。任何伟大的政治家都有历史的局限性。中国已经出现殖民经济和官僚资本主义，中国人民既要分担美帝的金融危机又要承担自身经济危机，已经积重难返。

回想48年前，我请教毛泽东主席：“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毛主席回答：“你们要跟人民在一起，跟生产者在一起，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生产者要真正当家作主，要实现毛泽东主席在1960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谈话》中指出的目标：“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我们不能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有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四卷第266—267页。）

可悲的是，很多人自私而不觉悟，一盘散沙，追求个人发财。比如，每年毕业的大专生至少六百万左右，都想当老板，结果，绝大多数人只能成为打工仔打工妹。他们不明白，只有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弱势群体的命运。

《国际歌》是人民大众求解放的心声，工农兵、知识分子和市民大众觉醒团结之日，就是社会主义复兴之时：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 也不靠神仙皇帝 /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 全靠我们自己 /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 / 让思想冲破牢笼 /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 /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 这是最后的斗争 / 团结起来到明天 / 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 这是最后的斗争 / 团结起来到明天 / 英特那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

2016年3月23日

~~~~~

## 【劫后反思】

忏悔的沉重——武汉二十中早期红卫兵的坦白

· 佚名 ·

### （一）也为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市第一个惨死于红卫兵批斗的女人

我终于走进了教堂，汉口上海路天主堂，全市或许是全省最大的天主堂。我的中小学时代很多天数从他的侧旁经过。那时我的居所就在他旁边的上海村。我的伯姐还在那里。这些年，稀有的几次路过，都有些难以言喻的情怀，且渐渐地沉重起来。最近的一次是去年冬天一个周日的早上，院门大开，尽管两旁彩旗悬挂，却是一时无人进出，庄重肃穆。我停下脚步，对老伴说，我想进去，我应该忏悔。老伴疑惑地看我，我们又有事，还是无言地离开了。我随着引导在圣母玛利亚面前，在庄重的仪式中诚挚的忏悔着。忏悔我曾有的罪过。

那是1966年8月，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一伙武汉市二十中学的红卫兵，本市最早的红卫兵队伍之一，冲进这座教堂。我们激情燃烧地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及其文化侵略，实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爆烈的行动”。我们在神圣的殿堂里，当着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推倒神座，扯下帷幕，砸毁用于礼拜的器物。抓来神父修士，驱逐他们到烈日暴晒的广场下跪，在他们面前点起火堆，焚烧圣经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文案，其中还有新近加入教会的人员名单，我们憎恨他们去做帝国主义的走狗。一阵风吹，火苗高蹿，作为副领导的，我把离火只有咫尺那一位拽后了一点，我担心万一出人命，这是“要文斗”的底线，是我们革命人道主义的体现。（前些天，高我一届的一位高三的女红卫兵，在批斗一位中年反革命家属时，听其邻居揭发的她想变天确凿证词后，义愤填膺，将火炉上一大锅她看起来温度不很高——因为天太热，其实是将要开的烫水，当头倾泼，便至其死亡。这是武汉市文革批斗中的第一死者，当晚，武汉市委管文教的邓小平的弟弟邓垦副书记来学校，在肯定红卫兵大方向的同时，示意我们就此打住，且尽量不转消息。）一顿折磨凌辱他们之后，为了显示“要文斗”的革命威力，我和当时的正领导把神父关进一小房间，盛气凌人地逼迫他承认神是不存在的，神父死不松口。我们便逼迫他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在这位正领导多次的挥着武装带的严重警告下，他勉强就着我们，一定是违心地，间隔地说了几个表示赞同的词语。我便张狂地反唇相讥他对上帝不忠，并故作大笑，庆祝我们唯物主义的彻底胜利。在我看来，作为红卫兵的精英，精神上的胜利远比肉体的消灭更能体现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与历史意义。基于此，我始终没有直接施暴于任何的牛鬼蛇神。当一个低年级的小红卫兵喝令只教过我半学期的姓刘，名字中有个毓字的女右派老师下跪操场当中后，我走过去，以领导训示之举，叫她起来，正告她要老实接受改造，她颤抖着不断的点着被剃光的头，我竟然有点恻隐之心。

我们的革命是彻底的，不少人连家里都没有告知，就夜以继日地干革命了。夜深了，我去查岗，放岗是为了防止阶级敌人反扑，一个初一的女红卫兵，应该说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有些害怕，我鼓励她，她反激将我，要我去钟楼顶。我回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拿过她手里的铁棍，走向完全的黑暗，登攀旋转楼梯。忽然，劈里哗啦，声响与气浪扑面而来，本能的恐惧，我迅疾抽身后退，但很快定下心来，我清楚，是蝙蝠，更勇毅地直冲楼顶，用铁棍奋力敲响大钟。下来后我骄傲又狂妄的宣称，我在江城敲响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丧钟。

在我的祷告之后，那位引导开导我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都免不了有罪过，无论是个人、团队，还是党派，都不是原罪，罪过的根源是撒旦，天主耶稣是来救赎人类的，撒旦正好相反，是要陷人类于罪恶之中，说我当时的一切作为，都是受了撒旦的诱惑欺骗、蛊惑唆使所致，譬如权势、地位，功名，还是别的什么欲望。他说的确实很对，当时特别鼓舞我的革命歌词就是“我们从事这革命事业，无比幸福无上尚荣光”，后来，我做了红卫兵总部纠察队代理队长，我那时是何等的趾高气昂？当市公安局派华沙牌小轿车接我们去调停他们与北京西纠成员（那可是毛主席的青年近卫军）的矛盾时，不是炫耀得很吗？而且，在“红色恐怖万岁”的鼓舞下，应该是说蛊惑下，和北京的西纠成员联手对黄石路的基督教的荣光堂进行了二次革命。当那位比我小的女西纠队员爽脆出口京骂“你妈的×”，同时用武装带扣头把神父的脸颊抽出血的时候，我钦佩至极，想到我对那位女右派的一点点恻隐之心，就惭愧起来，怀疑自己中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香风毒雾。如今来看，我正是偏离了人性的本善，更深深地堕入了撒旦的罪恶之中。我后来曾戴着柳藤帽，握着红缨枪去参加拔除造反派据点的战斗，只是因为对方撤离，要不，我的罪恶将是血腥的，如同那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样，完全的反人性反人道。

## （二）还为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市第一个在两派争斗中离去的年轻生命

我又随着引导，郑重地在额上沾上圣水，进入礼拜大厅。大厅正殿上，耶稣高高地悬在十字架上，灯光透过穹顶，像是从云罅渗出的夕照，余光有层次地散开，庄重、肃穆，混沌着宗教的神秘。我在黯淡的最后一排长椅边伫立着，默念着：我主耶稣洁净，洁净着我的罪行，感受着天主对我的宽容。其实天主早就宽容了我，而且我还可以狭隘或偏执地以为，天主还庇佑了我。我们在天主堂打、砸、烧之后，又去基督教的荣光堂革命，为了搜取我们自以为有的反革命的电台，枪支，我们在乒乓桌上架起4、5米多高的长梯，就要爬到天窗口的时候，梯子突然滑落，瞬间，我竟然稳稳地立在乒乓桌上，毫发无损。第二年6月初，一个叫张昌森造反派小头目在学校门口当胸打了我一拳，第二天晚，就被六中的与我同为保守派的一个红卫兵只打了一竹棍，就给打死了。成了两派武斗的第一死者。（6月4日，造反派抬尸大游行，催生两派大规模血腥武斗。）还有一个绰号叫鳄鱼的造反派，在学校操场朝我的额上打了一拳，后来，他在抢枪以后被同伙的流弹击毙了。我当时都是很高兴，很解气的。现在看，这其实就是罪恶，我以己大恶来回敬人之小恶，这又是应该忏悔的，我还应该祈祷他俩在天国里安息。但是我毕竟已经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了，我还是不信善恶有报，灵魂不死，生命轮回的，我的那位高呼过“红色恐怖万岁”，对神父的肉体实行过专政的正领导，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比我幸福得多。曾有的社会地位与生活享受也比我高。尚能宽慰我的，只是我最终进了大学，教授过文化学概论。我优于他的是有一点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

最后，我怀着一本《圣经》走出教堂，我的灵魂已经获得了救赎了，但我并没有感到轻松，我的脚步比我进院大门还沉重。我一下不能释怀，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段命运轨迹？曾经和我一起处过的两位女红卫兵及我们一伙的正领导，是不是像我一样忏悔了？我的回答为什么是否定的？这仅仅是个人的缺失吗？我沉沉的思考着。忏悔是一种文化事象，文化事象

有着穿透时空的内在定力，具有历史的恒定与坚韧。汹涌的文化大革命只是一个文化现象，而且是负能量的文化现象，就历史而言，必定是短命的昙花一现，它根本扑灭不了人性普世价值的心灵忏悔。这是文化的本质内力决定的。就我而言，我可能还会忏悔，但我绝不会重蹈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罪过，相反，我将会打开手中的《圣经》，来照见我曾有或未有的生活。我已经有了一点宗教感情，但与伟大的爱因斯坦相比，九牛一毛，天壤地别。爱因斯坦自诩的宗教感情，并不是与他的科学事业相悖的宗教迷信，就我看来，那是一种宽广卓然的人文情怀。

现在，我在天主耶稣或是《圣经》面前，会感到一种文化的温暖，人性的亲和。因而我又是坦白的，我仍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我那时的忏悔前后，心灵上并没有感受到明显的善恶差异，我最终也可能不会成为他的信徒，但我真诚地崇敬景仰天主耶稣，会完全的尊重他的所有的信众，这就是我已经有了的一份宗教感情。在世人面前，我有坦白直言：宗教本来就是一种文化，天主教、基督教和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一样，源远流长，滋养着我们人类。打开《圣经》，可以清楚地感受到那里面有着现代西方文明之精华，自由平等博爱，人性人道人权的人文源头。作为一个自以为有点文化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我，希望我的同胞更多的回归国学，回归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应该有更多的人皈依宗教，去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礼拜，至少可以像我一样，有一份愿意忏悔的宗教感情。我还坦白自己的心怀，今天的共产党及其领导集团，远非文革时期了，如若他、他们能够允许，放任其成员，甚至自己以个人的名义去孔庙顶礼，去教堂膜拜。那对我们现实的社会和谐，民族复兴及其长远发展应该是确有裨益的，因为，即便未来的共产主义，也应该是现世文化精华的继承与发展的结果。

□ 来源：《天涯论坛》

~~~~~

## 【书刊介绍】

### 《云南文革史稿》导言

• 周孜仁 •

云南作为边疆省，自古以来，距离中国的政治中心一直都显得很遥远。昆明著名的大观楼长联作者、清代诗人孙髯，在联中论及滇史，曾引“宋挥玉斧”一典，其意盖云，宋太祖赵匡胤得天下后，曾拔下绾发的玉斧在地舆图沿大渡河一划，称“此外非吾所有也”，其后150年西南疆果然鲜有边患。元明以降，虽然中央政权驻军屯垦，官吏由“土官”改为“流官”（所谓“改土归流”），逐渐强化了对云南的统治，但毕竟山河阻隔，云南的社会、政治、经济一直与全国的政权中心关系都相对疏离，直到上世纪50年代，用铁血军事手段建立的共产党中央政府才终得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

事虽如此，由于历史和地域的原因，云南的经济、文化总是处于相对落后的情况，其丰欠治乱，达与不济，对全国实在没有什么影响。直到1965年1月，第一条“通向国内”的铁路“贵昆路”才正式开通（原来仅有一条所谓“云南十八怪”之一的“不通国内通国外”的滇越“米轨铁路”，和一条更窄的“寸轨铁路”从锡城个旧通至盛产豆腐的石屏县），昆明机床厂（前身为抗战时期建立的中央机器厂）曾被誉为“全国八大机床厂”之一，其拳头产品“坐标镗床”销往内地，尚需绕道越南，从海防港转运广西再入境中国。据官方统计，1966年云南的工农业总产值47.5亿元，仅占全国的1.87%；财政收入5.4亿元，仅占全国的0.97%还少〔1〕。

经济的落后毫不影响北京强大的政治辐射力和行政管理效率。老百姓说：北京打个喷嚏，云南就会感冒。更何况“伟大领袖”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瘟疫，云南虽山河遥远，又如何抵挡得住？云南本来传统、平和、温润的社会怎能不遭遇大感染、出现大疯狂、最后演出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接见云南主要领导时明确称“云南是受林彪、‘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2〕此话确乎不假。

1966年到1976年，云南动乱的疯狂性、斗争的残酷性，群众间你死我活的仇讎厮杀，绝不下于全国其他省区，甚至更有甚之。文革10年，三任半省委书记，二人凶死（闫红彦自杀，谭甫仁被暗杀）、一人郁郁而终（周兴在全省动乱、尤其是滇南沙甸的军民武装大厮杀一个多月后病故）、贾启允被邓小平点将临危受命，可惜不满一年，即因贾在批邓风潮中“变节”而在1976年的风云突变后黯然落马，只算得半任。而两大派群众，十年间一直在政治博弈中彻底地、残酷地翻烧饼：先是恶斗3年，其中一派因“路线正确”稳掌大权7年，另一派落败，被“新生红色政权”以“划线战队”为由，以群众专政的形式对失败者实施镇压，造成冤假错案15000余件、打伤致残6·1万多人，迫害致死1·7万多人〔3〕。手握大权这一派曾经很自豪，说全国真正由造反派掌权的，除了上海，就只有云南了。

1976年十月政变，“四人帮”垮台，云南政局重新洗牌，过去惨败的一派转而上台，完全掌握了对另一派绝对的罪责追溯权。这一次，他们名正言顺以国家暴力的名义对失败者进行大规模的“揭、批、查”。据《云南五十年大事记》记载，全省共清查“重大事件”1816起，全省进入县以上机关的另一派群众代表，定为“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共7659人，分别被关押、审查、批斗。民间资料提供的数据则要大得多，据2017年3月10日原省妇联主任包亚芳等全省14个州市上访代表88人（均为入狱刑满的原群众组织领袖）写给中央第十一巡视组组长徐令义的申述报告〔4〕统计：“云南全省受到审查、批斗、办各种‘学习班’”共150多万人，判刑入狱的5万多人，判死刑2人。在整党“清理三种人”中，受到党纪、政纪、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无故清退回家等15万人。在审查期间，刑讯逼供打死、逼死、逼疯1000多人”对于主要的知名群众领袖，都进行了形式公开的“正义的审判”。本书附录全文照登了几则这些法律文书，在中国法制日益完善的今天，重读这些判决书中囿于时代、囿于当时政治需要而难免多用政治替代法律、以言定罪的荒唐可笑，不觉让人唏嘘。时过境迁，当年的荒诞激情与残忍互害早已烟消火灭，死难者的断碣残碑都付与了苍烟落照，幸存的风云人物，则已风烛残年，只能在因生活困窘而不断上访与“维权”中消磨生命最后的日子。

文革结束40余年后的今天，云南的掌权者已经换了一茬又一茬，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改革进入深水区。文革的惨烈悲剧让人们对于政治实用主义的虚假和对主义的真伪莫辩茫然于心，再无兴趣。云南几千年曾经淳朴的民风旧俗不复存在，激情岁月的信念和理想亦随风远逝，唯有物质主义成为了最为现实亦最为诱人的奶酪，于是，短短几十年，云南就有了全国闻名的白恩培、李嘉廷、仇和、孔垂柱、沈陪平、高劲松〔5〕等为代表的一长串大小贪官“塌方式”地倒台。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老百姓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执政当局自己的头疼事还多着呢，哪有工夫去考虑他们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云南边疆当年的草民英雄，他们的问题本来就是历史酿成的，也就只能让历史去遗忘与评说了，说得再具体一点，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等待自然规律去彻底了断他们的诉求。

同样，作为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现在唯一能够、也应该做的，就是将他们，及与之相关的云南文革岁月故事打捞起来、抢救下来，记录于纸，留给后人记忆、解读和评说。

注释：

〔1〕《当代云南大事纪要》（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335页。其时全国的经济总量：工农业总产值为2534亿元，财政收入为558.7亿元。

〔2〕中共云南省委党史办《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纪实》第418页

〔3〕《当代云南大事纪要》第371页

〔4〕 共有14个州市88名代表实名签字。

〔5〕 白恩培，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十年，2006年以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李嘉廷、曾任云南省长，2001年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缓；仇和，曾任云南省委副书记，2016年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孔垂柱，曾任云南省副省长，2014年3月，接受调查期间查出艾滋病，自杀既遂；沈陪平曾任孔垂柱秘书，后为云南省副省长，2015年，沈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高劲松，曾任昆明市委书记。2017年，因犯受贿罪、行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

## 【春秋史笔】

### 红太阳陨落前最后三年

• 张 戎、乔·哈利戴 •

〔本文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第五十八章 最后的日子〕

◇ 邓小平迫毛让步 1973—1976年 79—82岁

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他在毛死后实行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的航向。

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〇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意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同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跳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演变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个好处是他喜欢开短会，中共夺取大陆后他负责大西南，开的第一次军政委员会全体会议只花了九分钟，与一次开会讲了九个钟头话的周恩来迥然相异。有人说，周的风格是举轻若重，邓是举重若轻。邓处事果断，不少复杂的政务是在桥牌桌上解决的。

从法国邓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长征时，他是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管辖两个野战军。这两个战役开始前，毛泽东对他简短而信任地说：“交给你指挥了。”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毛的政策，邓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时，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回避自己，说：“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发动文革时，曾一度考虑过要邓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邓不赞成毛搞文革，不为所动。毛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根据他仇恨的程度。毛说：“邓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欣赏邓的能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江西的夏天湿热难耐，怕儿子长褥疮，邓和妻子每天数次帮他翻身，替他擦澡。这是件很劳累的活，因为朴方个子大，小名“胖子”。

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痛苦中他进行着反思。结果是，在毛死后，他摒弃了毛搞的那一套，改变了中国。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锻炼身体，等待机会回到政治中心去。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来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入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都惴惴不安，但他毕竟有政治家的风度。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份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尽管他抛弃了毛的主要遗产。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

邓等人得以结盟，归根到底是由于年迈的毛病得不轻。终身的嗜好抽烟就是在此时忍痛戒掉的。眼睛半瞎，他对自己的安全比以往更加担心。身边工作人员接到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进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视力模糊不能看书，一生手不释卷的毛难以忍耐，他叫人把一些文革中禁止出版的古典文学作品印成大字本看。为了印这些大字本，北京、上海各建了一个印刷厂，每册印刷量五本上送毛。为了保险多印了几本，作为档案封存。参与注释、校点的学者一本也不许保留。随着毛的视力越来越坏，大字本的字号也越来越大。当毛发现即使用放大镜也看不清这些特大号字时，他忍不住痛哭起来。他只得靠工作人员读书给他听。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离开北京到南方去。不久，眼疾诊断出来了，是白内障，成熟后用小手术很容易摘除。虽然等它成熟要等一年，毛也长吁了一口气。他在南方待了九个月，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出行。

为毛检查身体的结果还发现，他患了一种极少有的运动神经元病，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手、腿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坏死，身体逐渐麻痹瘫痪。由于喉、咽、舌功能失调，食物和水会流入气管囤积肺中，引起肺部反覆感染。在最后阶段，不仅无法吞咽，而且无法呼吸。这是不治之症，根据毛现有的病状，他只能活两年。

医生们依汇报程序报告了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汪报告了周恩来。正是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周的胆子大壮，虽然外表上，他对毛是照常的恭顺。

周的盟友邓，叶也得到这一消息。他们决定不通知“四人帮”，连毛的夫人江青也不告知。告诉江青是自找麻烦。两年前毛休克，她骂医护人员是“特务”、“反革命”。周恩来找她讨论毛的病情，她反说周要逼毛交权。可是，这次不告诉她毛的病情，不光是怕她乱指控，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斗争的需要。

毛本人也被瞒着。他要是知道自己只能活两年会怎么反应，谁也不敢说。医生们对毛说他的身体很好，还可以活很多年。有一个外来的医生说了句：“主席的病不好治啊！”马上就被送了回去。对病状的解释是上了年纪之类的话，毛半信半疑。为了保证把毛蒙在鼓里，真实病情对他贴身的工作人员一律封锁。

知道了毛来日无多，再加上周恩来本人也病入膏肓，邓一周一叶联盟行动起来，要让毛指定邓做周的接班人，把一大批文革中打倒的老干部任命到关键位子上。十二月，周拖着病体飞往长沙，带着人事安排的名单去见毛。毛对这些老家伙在京城做些什么心知肚明，他有留守北京给他通风报信的“四人帮”。江青说她对看到的“咄咄怪事”，感到“触目惊心”。但是毛没有办法管束邓、周、叶等人，军队在他们手里。“四人帮”对军队毫无影响力，毛又无法在军中新建一支与邓、周、叶抗衡的力量。他力不从心。

怪病缠身的毛一天天衰弱下去。刚离开北京南下时，他还可以在院子里散散步。几个月后，他就只能拖着步子一点一点蹭。十二月五日，他在长沙的游泳池里只划了划水，发现手脚实在划不动，那天便成了他与终身爱好的游泳诀别的一天。游泳池边，毛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是意志力极强的毛从未发出过的声音。跟他二十七年的警卫队长听到时惊呆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肌肉萎缩器官失调的结果，毛说出的话越来越不清楚，饭菜也不断掉进肺里，他不断地呛着，肺部不断地感染。毛只能侧躺在床上由人喂饭。

在这样的状况下，毛只能认可周恩来送上的人事名单，特别是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代行周恩来之职。毛没有完全示弱，他把张春桥提拔为不论在政府还是在军队都仅次于邓的人物，而且把媒体让“四人帮”牢牢把持，使他能够直接向全国发号施令。

邓、周、叶的策略是先利用张春桥、江青历史上的污点打击他们，把他们搞掉，以架空毛。十二月二十六日毛八十一岁生日那天，周以严肃的神情对毛讲这两位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毛说他早就知道了，意思是有问题又怎么样？

一向俯首帖耳的周，竟然胆大包天地当面把毛的妻子和亲信打成敌人。毛知道他面临一番恶战，他和“四人帮”一边，同邓、周、叶以及重新任职的老干部对阵。

此时邓在全国大批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毛指示“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三月透过媒体发起一场针对这批人的“批经验主义”运动。四月，毛回北京后，邓当面向毛表示反对这场运动。毛被迫说同意邓的意见，把运动怪到“四人帮”头上，叫江青做检讨。五月三日，当着整个政治局，毛停止了批经验主义的运动，说：“我犯了错误，春桥的文章，我没有看出来。”这样带表白性的认错在毛是破天荒。毛明白自己的虚弱，到会的人都看得出来，他眼睛几乎全瞎，说话嘟嘟囔囔，一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样子。这是毛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

会上，毛反覆讲“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他的意思是：不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要跟我分裂，不要搞阴谋害我。这是毛对中共最上层的老家伙们提出的请求。那段时间，毛三番五次对他们讲“周勃安刘”的故事：在刘邦死后，军事长官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铲除掌握了政权的吕后一党，使汉室重新成为刘家天下。当时，人人皆知江青以吕后自诩。毛讲的故事给老家伙们一个信息：你们不妨也像周勃、陈平一样，搞掉江青一党——等我死了以后。

听毛讲故事的有军队将帅，他们在文革中吃足了苦头，现在由邓周叶联盟委以重任。他们不跟毛翻脸则罢，要是翻脸，毛就岌岌可危了。尽管张春桥、王洪文被安插进军队，也无济于事。

一九七五年六月，军队对毛进行了一次示威。那是贺龙元帅去世六周年纪念日。贺龙因为不幸听见了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说要“搞掉毛”的话，成为毛疑心的焦点，惨死在监管中。军方决定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毛无法阻止，只能规定“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导，不宣传”。在军方支持下，贺龙长女给毛写信，指出贺龙一案牵连了一大批军队的人，对贺龙后事的这种做法在军队行不通。毛只好答应安放仪式怎么搞由周恩来安排，但强调一点：“不登报”。

仪式笼罩在一派悲痛的气氛中，周恩来以体重仅三十来公斤的垂危之躯，挣扎着前来参加，并且感情冲动地致了悼词。他一进会场就喊着贺龙遗孀的名字，扶着她的肩膀，声泪俱下地说“我很难过”，“我没有保住他啊！”

周措辞很巧妙，“保”而没“保住”，根子在他的上峰：毛。周需要洗刷自己，他是贺龙专案的负责人，贺的死，以及贺部下的入狱、受刑、死亡，他都有责任。人们对他有气，他很清楚。他缓缓对在场的人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就这样，他争取了同情，把人们的不满导向了毛。

毛从来是拿别人做替罪羊的，不习惯别人把责任赠还给他。他非得要报复周不可。七月二十三日，他在岳飞《满江红》的激昂曲子陪伴下，做了左眼白内障摘除手术。手术只花了七分钟，结果完满，毛十分高兴。

眼睛复明使毛信心大增，两个星期后他便搞了个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这是毛影射周恩来。周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伍豪启事》这一纸谎言还可能在他死后败坏他的名声。九月二十日，在做一个大手术之前，术前镇静剂用过了，医生都等着周，他仍花了一个小时反覆斟酌他就《伍豪启事》做的自我辩护，用颤抖的手签上字，交给他夫人，才放心地

躺上了手术车。进手术室前一刻，他对周围的人大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几天后，邓见到毛，对批《水浒》运动明确表示不满。毛又把过失推到江青身上，用他喜爱的辞藻骂道：“放屁！文不对题！”运动不了了之。

邓有了权后干的一件重要的事，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上议事日程。文革中，谁提生活水准谁就是搞“修正主义”。在毛统治中国四分之一世纪后，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仍困苦不堪。即使在相对优越的城市里，衣食等必需品都处于严格定量之下。说到“住”，三代同室的情况比比皆是。城市人口增加了一亿，但盖的新房子寥寥无几，老房维修几乎不存在。一九六五到一九七五年的十一年间，整个城市建设的投资，包括水、电、交通、排污等，不到同期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投资的百分之四。这些年中，对医疗、教育的投资，比中共上台初期本来就小得可怜的比例，还少了一半多。农村更是一贫如洗，大多数农民吃不饱饭，有的地方成年大姑娘没有衣服穿只得赤身裸体。“革命圣地”延安，老百姓比四十年前共产党刚到时还穷。延安城里满是饥饿的乞丐，有外国人来瞻仰圣地时，官方便把他们“收容”起来，遣送回乡。

毛泽东对他的“子民”的境况知道得清清楚楚。从收集下情的管道来的文件，毛每天都读，或是让人念给他听。一九七五年九月，他对越共领导人黎笋说：“现在天下最穷的不是你们，而是我们。”哪怕越南燃烧了三十年不停的战火，经历了美国的狂轰滥炸，中国人还是穷过越南人。然而，当邓小平设法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时，毛的“四人帮”却说：“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邓干的另一件事，是使荒芜的文化领域有了点生机。这时上演了几部剧情片。尽管它们无一不是歌颂共产党的，江青仍然对它们横加攻击，用漂亮女演员也成为罪名。

老百姓看不到电影，毛却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解放后”的，“解放前”的，香港的，西方的。他特别喜欢坐在家欣赏戏曲。名角儿们便从流放地被召回，在空荡荡的北京电影厂、电视台摄影棚里，专为毛录音拍戏。没人对他们解释为何来演唱这些早就被禁的“反动黄色”的东西，只有人警告他们不许问问题，不许交谈，不许向任何人提起。录像由电视转播车从毛的住宅外，直接发送给毛独家欣赏。

因为他的政策，邓小平不时同江青发生争执，有时拍桌子骂她，成了除她丈夫外这样对待她的第一人。邓也当面对毛谴责江青，并鼓励电影导演和其他文化人给毛写信告她的状。邓的做法就是否定文革，而毛把文革看作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毛不能让邓得逞。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他要邓主持做一个肯定文革的决议，等于要邓自己把自己限制起来。

邓拒绝做这个决议，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他是当着一百三十名高级干部的面说这番话的，态度强硬。毛只好放弃做决议一事。但他同时也决心再次打倒邓小平。

周恩来、叶剑英都曾劝邓不要操之过急，等毛死了再说。但是邓不愿意等，他估计他可以逼毛让步。邓看到的是毛的极度衰弱，但他见不到的是，在这衰朽的躯壳下，毛保持着不可摧毁的意志和惯有的老谋深算。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七十八岁的周恩来去世。邓的主要盟友一死，毛马上行动，把邓的职务实质上解除，将他软禁在家，在全国搞“批邓”。对叶剑英，毛也同时下手，以“生病”为名拿掉了他的军职。毛指定“老实”不起眼的华国锋接替周恩来，同样不知名的陈锡联代换叶剑英。毛用他们而不用“四人帮”是因为“四人帮”太不得人心，毛希望尽量减小对他决策的阻力。

周恩来的死成为导火线，点燃了举国上下长期压抑的对文革，乃至对毛的奔腾怒火。头一年，邓在台上时，“谣言满天飞”，把周塑造成一个为老百姓呕心沥血，跟“四人帮”斗争，受“四人帮”迫害的悲剧英雄。人们对他的死表现了真诚的悲伤。媒体受命低调宣传，大家更加愤慨。当周的遗体从医院运到八宝山公墓火化时，北京一百多万人自发肃立几十里长街两侧为周送行，形成了毛政权下从未有过的壮观景象。追悼会那天，就连毛谨慎寡言的秘书张玉凤也问他：“主席你是不是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毛翘了翘他半瘫的腿，说他走不动。可人们把毛不出席看作是他故意贬周。不久后是春节，毛的住宅放了鞭炮，中南海里的人悄悄传说，这是毛在庆祝周的死亡。

四月初，火山终于在清明扫墓时分爆发。人群汇集在天安门广场，用花圈与诗歌悼念周恩来，声讨文化大革命。同样闻所未闻的是，人群捣毁了企图清场的警车，放火烧了“四人帮”组织的民兵指挥部。这场暴动，就发生在离中南海咫尺之遥的地方。

毛政权用血腥手段恢复了天安门广场的“秩序”。江青喝茅台以资庆祝，毛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镇压在全国进行，不过已是强弩之末。

虽然邓小平并不是天安门抗议活动的后台，可是广场四周松树上挂的许多与“小平”同音的小瓶子，叮叮当当地响着人群对他的拥戴。毛害怕邓同人民结合起来，下令把邓从软禁的家中抓走，关在北京的另一个地方。

毛没有用残酷的方式来对付邓，相反地，他发话要保护邓。这并不是因为毛对邓念念不舍，他是怕邓在军队的追随者愤而采取激烈措施，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生命。军队实际上仍在叶剑英的掌握中。叶在西山住地，每天接见川流不息的军队将领，直接针对毛的话，说他没病，“谁也休想赶我走”。在朋友中间，叶对毛的称呼已不再是尊称“主席”，而是“拿摩温”，英文 number one（“一号人物”）的音译。虽无贬义，也是不恭。

在叶的住处，将帅们半公开地讨论他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外号“胡子”的王震将军对叶说：把“四人帮”“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因为怕窃听器，叶打着哑谜，先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了按。“胡子”将军猜明白了：大拇指指的是毛，他在世时不宜轻举妄动，等去世以后再说。“胡子”将军找到他从前的下级汪东兴，代表军方嘱咐他要保护好邓小平。

毛清楚西山里出出进进在搞什么名堂，但他在军队新任命的人完全无力抗衡，他本人命在旦夕，无回天之力。他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样焦躁无奈的情绪下，他的心脏病六月初大发作，把他搁在死亡的门口。

毛的病危通知发给了政治局和主要大夫。当时邓的夫人因眼疾住在专给高层——包括被打倒的高层——看病的三〇一医院，一位跟她亲近的医生把毛病危的消息告诉了她。这样一个绝密消息马上被透露给主要政敌，标志着毛的铁腕已松弛到何等地步。邓一得知这个消息，就在六月十日给毛写信要求回家，等于是要求释放。

毛不敢拒绝，在月底病情好转时答覆：“可以同意”。邓的归期被延迟了几天，因为朱德元帅在七月六日以九十高龄去世。朱德在文革中受了不少罪，毛怕他的死也像周一样引起全国抗议浪潮，怕邓卷进里面去。抗议浪潮没有出现，毛才在七月十九日放邓回家。邓在深夜被一辆汽车悄悄接走。

这一次邓只关了三个月。虽然放出来后仍是软禁，毕竟邓是跟一大家子亲人住在一起。毛奈何不了他。

#### ◇ 最后的日子 1974—1976年 80—82岁

仇恨、失意、自怜，笼罩着毛泽东最后的日子。这些早就在他的性格里躁动的情绪，在生命临近终结时，由毛赋以特殊的表现方式。他喜欢六世纪庾信的《枯树赋》，为一度繁盛的大树枯萎凋零感怀伤情。按诗人的原意，大树所以没落，是因为在移植中伤了根本，作者借此感慨自己飘零异地的身世。但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毛对注释诗文的学者提出异议，说大树的遭遇“不是移植问题”，“是由于受到了急流逆波的冲荡和被人砍伐等等的摧残所造成的”。以树喻人，毛当然想的是自己。几天前，邓小平和他的同盟者刚逼着他屈辱地当众认错，说“我犯了错误”，取消了针对他们的政治运动。用江青的话来说，邓等人是在“欺负主席”。

而毛在一九七六年七月还不得不放邓回家。就在这时，他让秘书把《枯树赋》给他读了两次，然后自己开始背诵，用微弱、吃力不清的声音慢慢地背，句句都是伤感之情：“……前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凄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是毛一生中所读、所听的最后一首诗词。

在大限将至的岁月里，毛痛恨的不只是邓，周恩来也在其中。早在一九四一年，毛曾写过九篇痛骂周恩来等人的文章，语言尖酸刻薄，毛一直不便发表它们。一九七四年六月，毛不得不让周做了第一次手术。他由于自己病重而不敢把周逼狠了，唯一泄愤的方法是重读那九篇文章。毛死前一个月，又让人把这些心爱之作读给他听，回味宣泄的快感。

毛在“九篇文章”中对当时的盟友刘少奇曾称赞有加。重读时毛把对刘的赞词从文章中全部划掉。

重读这些文章，毛脑子里或许还转着文章攻击的主要对像王明。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王明死在莫斯科。四十年代，毛曾想毒死王明，后来不得不放王明移居苏联。据赫鲁晓夫和王明的儿子王丹之说，毛还下过一次手，结果王明没死而他儿子的爱犬被毒死了。王明对于毛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不时做反毛的对华广播，文革中还计划飞返中国，在新疆建立根据地，以图推翻毛。这个计划由于苏联不支持而未实行。

从四十年代中毒以后，王明就不断生活在病重、病危之中，最后几年，生命更似一缕游丝。他的内脏全被腐蚀坏死，到后来什么都不能消化，一点点东西，要嚼三、四个小时，算一顿“饭”。

毛几乎所有从前的同事都已魂归西天，多数的死同他有关。然而，这些死对他都有些“美中不足”。王明死在他鞭长莫及的苏联。刘少奇、彭德怀死了，毛不敢公诸于世。周恩来的死激起天安门广场大示威。林彪逃出了国境，差点就安然无恙，而且留下一道摆脱不了的暗杀他的阴影。邓小平呢，还活着，享受着天伦之乐。

毛自我感觉是个失败者。几十年苦苦追求也没能称霸世界。原子弹有了，可是“有弹无枪”，已有的导弹能把它准确地射过边境就不错了。巨额投资的中国军工产品质量差得一塌糊涂，而且浪费奇大，效益奇低。毛一九七五年接见海军负责人时伸出小指头，万般遗憾地说：“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毛会见基辛格时，扳着指头数着说：“世界上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我们落后。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我们是倒数第一。美国、苏联、欧洲、日本，中国——你看看。”福特总统访华时，毛对他说：“我们只能放空炮”，“骂骂人”。

一九七四年，毛生前最后一次努力要争做世界领袖。这次毛仰仗的不是军事实力，而是中国人民的贫困。他重新划分“三个世界”，把贫困作为“第三世界”的定义，这样一来他便是当之无愧的第三世界领袖。毛的确被恭维为第三世界领袖，但享有此称号的人不少。第三世界并不听命于毛，毛也没起什么领导作用。就像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是与不是有什么两样呢？”

即使毛培植起来的人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一九七五年夺权没有毛的援助是办不到的。导致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死亡的波尔布特掌权后来见毛，毛夸奖他的奴隶营式的统治，说：“你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举消灭了阶级。”住在中国享福的西哈努克亲王被毛送回柬埔寨，在软禁的环境里给红色高棉作招牌。尽管毛给了波尔布特无穷的好处，波尔布特却完全不领情。亲毛的柬埔寨领导人克·米（Keo Meas）被拷打致死，档案上这样写着：“这条可怜虫的死是罪有应得。你这个腐朽的杂种，竟胆敢说柬埔寨共产党是在毛的影响之下。”

在世界舞台上，毛能抓住的只是一个模糊的光环。尼克松的女儿朱莉（Julie）来访时戴着一枚毛像章，她后来写道：“他的反应简直像个孩子，兴奋得不由自主地紧紧抓住我的手。”为了持续保持知名度，毛见外国政要一直见到临死前三个月。可这些会见有损他的领袖形象。泰国领导人说他们进房时毛在“打呼噜”。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描绘道：毛说话哼哧嘟哧，头歪倒在沙发背上。从当时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毛脸如蜡像，两腮下坠，口角流涎。一九七六年五月底，毛看到他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Zulfikar Ali Bhutto）的照片后，再不见外国人了。

毛因未能实现做世界领袖的雄心而伤感。他的伤感不是为他的国家和人民。为追逐他的梦，为巩固他的权力，他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造成七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亡。对此毛没有表示过任何遗憾。他心头只有自己。毛后期很爱哭，任何使他联想到征服中国的辉煌——像看宣传电影中中共军队进北京——和现在的失意，都能教他泪飞顿作倾盆雨。他身边工作人员常见他“激动得泪如泉涌”。自我怜悯，这就是毫无怜悯之心的毛泽东临终前最强烈的情绪。

毛这时喜欢的古典诗词，抒发的都是英雄豪杰“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情。这份感情使他与全世界的“壮志未酬”的大人物认同。其中最显着的是因水门事件下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毛一而再、再而三对他表示同情。尼克松离开白宫不久，毛托菲律宾的马科斯夫人给他带话，问候他，请他来中国。尼克松的女儿和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David Eisenhower）第二年来华受到惊人的热烈欢迎。毛对朱莉说：“马上给你父亲写信，说我想念他。”朱莉回美国后，中国驻美联络人员告诉她说，毛“把你看作一家人”。这样的话，毛一生中大概没有对第二个外国人说过。

一九七六年二月，尼克松再度来访。为了此行，毛派了架波音七〇七，载上外交部的礼宾司长，专程到洛杉矶去接他。这个姿态也是闻所未闻的，特别是中国飞机很有可能被扣



下，做为中国没收美国在华财产的抵押。与尼克松重逢时，毛以茶代酒，跟尼克松碰杯。尼克松走时，毛步履艰难地陪他到门口，无限惆怅地同他告别。毛就是把尼克松接来道别的，为尼克松上演的文艺节目里，毛特意安排了他心爱的古典诗词演唱，其中有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有萨都刺的《百字令·登石头城》：“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有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谪新州》，里面更叹道：“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

对尼克松，这些都是对牛弹琴，他听得枯燥无味，疲倦已极。毛是在为自己抒发感情——尽管他不在场。

毛的伤感情怀还有一个寄托者，他就是被毛赶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防止蒋卷土重来，毛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八十九岁高龄的蒋介石死在台湾，临终留下遗言，棺材不落土，要等到共产党垮台后葬到大陆去。令人想不到的是，毛泽东私下为他举行了一场个人的追悼仪式。

那天，毛只吃了一点点东西，沉默庄严地把张元干的送别词《贺新郎》的演唱录音放了一天。这首词只有几分钟长，反覆播放便形成一种葬礼的气氛。毛时而静静地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悲怆。词里写道：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这两句意思是：你我都是胸怀古往今来和国家大事的人物，不是那些卿卿我我谈论儿女恩怨私情的人。毛在跟蒋介石谈心。

词的最后两句，原文是：“举大白，听《金缕》”，表示满腔悲愤，无可奈何，只能借饮酒写词听唱来消愁。为蒋介石送葬后几天，毛仍念念不能释怀，下令把这两句改为“君且去，不须顾”，重新演唱录音。这一改，使送别的意味达到高潮，送朋友流亡外地变成了生离死别。毛向蒋介石做了最后的告别。

尼克松、蒋介石都是被推翻的，在毛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被推翻。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他只见过短短的一次，没什么交情。可是，皇帝被军事政变赶下台，一九七五年死在监狱里时，毛着实伤心了一番，不断说：“做得好好的一个皇帝，为什么要被别人推翻呢？怎么会落到这个下场呢？”

正是这种担心，驱使他邓小平等人暗示：别动他，尽可以在他死后清除江青一党。毛只求自己生前不出事，对他死后天塌地陷毫不关心。毛没有指定“接班人”。

毛其实根本就不相信他打的天下会长久。死前他只有一次对为他管事的华国锋等人说了几句关于未来的话。未来在他脑子里是“动荡”，是“血雨腥风”，是“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没有留下任何遗书，也没有向任何人交代遗言——尽管足足有一年，他知道自己死期已近，有充裕的时间预备遗嘱。

毛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在中南海内一所其貌不扬的风雨里度过。房子是专为他修的，可以防地震，只有代号，叫“二〇二”。一九七六年七月底，北京被近邻唐山市的一场七·八级特大地震所震撼。毛身边工作人员把他匆匆抬进那里。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多达数十万，官方说二十四万，非官方估计是六十万。如果中国当局接受国际援助的话，伤亡本可以大为减轻，但毛政权对外国援助一概拒绝。在北京和其他城市里，千百万人睡在露天，“四人帮”控制的媒体却号召人民“在废墟上批邓”。

九月二日，江青要出北京，来征求毛的许可。毛先说不同意，后来她又要求，毛便答应了。三天后，毛突然丧失神志，江得到通知立即返京。这时毛床边有以华国锋为首的政治局成员昼夜值班，回来后的江也参加，但站在毛的床后，因为毛一清醒看见她，就显得烦躁反感。毛的儿女一个也不在身边。

九月八日，毛从昏睡中醒来，喉咙一阵咯咯响，他想说什么话。在毛身边十七年的理发师兼服务员周福明把一支笔塞进毛的手中，毛的手抖了半天，在理发师举起的纸上艰难地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喘息了一会儿，他又慢慢地抬起手，吃力地在木板床上点了三点。理发师猜到了毛要什么，原来是毛要看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三木武夫的消息。毛从来没见过三木，对他也没什么特殊兴趣，此时对三木的挂念，缘于自民党内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要把三木赶下台。

关于三木的材料拿来了，毛的女友兼护士孟锦云用手托着给毛看。毛看了几分钟，昏迷过去了。这份关于又一个政府首脑将要倒台的材料是毛最后的读物。

不久，毛声音微弱地对孟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这是毛说的最后一句话。以后他再也没从昏迷中醒过来。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死了。他的脑子直到临终都保持清晰，清晰地转动着一个念头：他自己，和他的权力。

#### ◇ 尾声

今天的中国，毛泽东的像仍然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停放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心。中共现任领导人自称是毛的继承者，竭力维持着毛的神话。真实的毛，依然鲜为人知。

□ 摘自《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华夏文摘》网址： <a href="http://www.cnd.org/">http://www.cnd.org/</a>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 <a href="mailto:tougao@cnd.org">tougao@cnd.org</a> 其它事项请电邮： <a href="mailto:cnd-cm@cnd.org">cnd-cm@cnd.org</a> |             |          |

---